



“太平绅士”黄保欣： 毕业于厦门大学 致力于香港发展

2019年7月22日凌晨，一位对香港回归及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贡献的长者逝世。他是黄保欣，享年96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林郑月娥说，黄保欣是成功企业家，早年致力推动香港塑胶业发展，对香港经济发展贡献良多。

□ 毕亚军 付国豪

毕业于国立厦门大学

黄保欣1923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下浦村，兄弟中排行老大，父亲是西医医生。在泉州培元中学读书时，12个学期里有10个学期，黄保欣的成绩都是班级第一名。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国立厦门大学，专攻化学专业。

受家庭的影响，黄保欣自小就对国家和民族有深厚的感情。生逢乱世，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磨难也深深烙印在他心里。

“九·一八事变时，我上小学，老师让每个学生画一张东三省地图，让我们要记得东三省，要把它收回来。”

1938年，厦门被日本占领，黄保欣被父亲送到香港姑母家，准备在那里读书、学做生意。但期间得知原班同学准备集中军训，然后下乡兴办战时国民学校，他又回到了家乡。

因为这些经历，每当有记者问黄保欣为什么这样爱国时，他都会说：“我的环境就是这样，你们没有那个经历，很难懂的。”

大学毕业后，黄保欣到福建省研究院工业研究所工作。内战爆发后，工业研究所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适逢一个朋友正计划在厦门双十中学复学，就请他去教了一学期的书。正逢“一二·九”学生运动，厦门大学的学生开始组织游行。

“他们要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去参加，那天我刚好在教书，我的教室刚好对着大门口，很多同学看见游行的队伍也想去，我就把笔放下跟学生说，你们愿意去的就去吧，我们不上课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1月，黄保欣和同是厦门大学毕业的校友吴丽英结婚。黄保欣和吴丽英一个念化学系，一个念历史系，因相互仰慕才华与人品，而缔结缘谊，并相伴终生。

内战爆发后，内地形势日益紧张，黄保欣再也无法继续教书。此时，他在菲律宾的华侨姑母回到香港，重新开张在二战期间被迫中断的生意。黄保欣与妻子一起过去支持。吴丽

英在爱国学校培侨中学教书，黄保欣帮助姑母照顾生意。

他说：“当时就想最多两年就回到国内，因为内战总会结束。”黄保欣当时的公司只有6个人，但他对祖国的感情却很深。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香港一共只有两面五星红旗，其中一面是黄保欣的公司挂起的。

1952年，黄保欣回到广州，找朋友帮忙，写了20张纸的自传及简历，自荐回内地参加工作。等待确定期间，厦门组织了第一次对外开放的土特产交流会，香港福建商会组团参加。经过广州时，团长生病，黄保欣代理团长。

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停留了很久，来时穿的都是秋天的衣服，但工作一直做到了冬天，回到香港时，我就病了，住院三个月。医生告诉我休息一年。”

黄保欣不得已取消了回国的计划，在香港专心做生意。“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建立联侨企业有限公司

决定留在香港后，从小希望做工程师、教师或研究工作的黄保欣，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做生意。

“之前，我工作的公司很小，做一些土特产等等东西。我是念化学的，一直觉得这些跟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就想，既然已经决定要做生意，就要做自己在行的。”

1958年，黄保欣与朋友合资建立联侨企业有限公司，开始做自己专长的化学品生意。在培侨中学教书的妻子吴丽英也辞去工作，加入公司，和黄保欣一起创业。

联侨最开始的业务包括塑料工业、电池工业、橡胶工业、搪瓷工业的原料供应，之后，慢慢转向以塑料为主的贸易及制造业务。

那时，香港的塑料工业刚刚起步，很多工厂缺乏专业知识。“比方说买原料做塑料花，看原料行不行，没有科学的办法，就用牙咬一咬，软的做叶子，硬的就做枝子。我就告诉大家要看溶解系数，溶点在10以下的做什么，10以上的做什么等等。”

同行普及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受到业内尊重，很多塑料类企业都成为了联侨的客户。随着市场的扩大，厂家技术性的要求也相应提高，黄保欣又利用所积累的知识，率先向厂商提供技术性的数据信息和市场情报，并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到香港推广，其塑料注塑机更是占到全港同型人口机器60%到70%的市场，成为市场上最权威的供货商。

与此同时，与日本一些著名跨国公司保持良好合作的黄保欣，经常带一些香港的塑料生产商到国外参观考察，不但让塑料原料商和生产商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也推动了香港塑料行业的整体向前发展。

1974年，香港塑料业界专门成立了香港塑料原料商会，在业内享有声望的黄保欣被推举为商会主席，一直任职到1989年。

期间，他领导会员撇开恶性竞争，相互磋商、联谊，齐心协力为发展香港工业和经济尽力。在他的推动和塑料业者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塑料产品成为了香港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黄保欣也因对香港塑料行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赢

得了“塑料原料大王”的称号。

就在联侨企业蒸蒸日上、最为红火的时候，黄保欣却将企业的发展重任全权交给了妻子吴丽英去做，自己则选择投身到社会事务中去了。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对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黄保欣，因此脱颖而出。

1962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改选，黄保欣被选为会董，1965年又被推举为常务会董，开始在每年一度的工业展览会任职。这期间，他深入研究经济社会问题，时时创新提出有益意见。

比如，1967年工展会在红磡举行，黄保欣担任布置部长。他颇有创意地在大会入口处树立两个大牌，一边是10年来香港进口金额的增长曲线，另一边是出口金额的增长曲线，首次将香港的贸易数字展现在大众面前，令人印象深刻。

1970年，厂商会再次改选，黄保欣当选为副会长，后又应聘为名誉会长，开始更广泛地参与其中工作。两年后，他以厂商会代表身份被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及工商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推动香港及家乡发展



董建华与黄保欣

1974年，黄保欣率领贸易发展局出访东欧，成为香港贸易团访问东欧的先驱。随后，他又多次率团访问东欧、西欧、美洲、澳洲以及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进一步拓展香港的海外市场。

1976年，黄保欣任厂商会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团团长，率团访问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华盛顿、达拉斯及洛杉矶等各大城市，代表厂商会在这些城市的议会发表演讲，介绍香港情况，并获得美国达拉斯颁予的“荣誉市民”称号。

1977年，黄保欣获得英国女王颁授OBE勋章，表彰他对香港工商业发展及促进香港对外贸易的贡献。次年，黄保欣届满6年，退出贸易发展局。随后，黄保欣于1979年获任香港立法局非官方议员，一直担任到1988年。

1980年，黄保欣又以个人身份被委任为香港贸易发展局委员，从事工作将近10年。期间，他专注担任该局中国贸易咨询委员会主席，全力为贸易发展局拓展内地工作。

在任立法局议员的9年时间里，作为立法局财政委员会及工务建设小组成员的黄保欣，专注于香港经济发展及财政预算，提出和促成了很多事关香港市民利益和前途的重大问题。

比如，他一直关注和牵挂香港的高等教育。在香港还只有“港大”和“中大”两所大学时，他就在立法局会上指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香港应有7所大学。如今，香港已办起7所大学，他所言非虚。

投身社会事务以后，黄保欣虽身兼多职，但对每一份工作都尽心尽责，深得公众拥戴。

1980年，黄保欣荣获“太平绅士”称号。1993年，香港城市大学理工学院授予他名誉工商管理学博士。在赞辞中，学院给予了黄保欣这样的评价：“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黄保欣先生服务于香港社会

大众已10多年，自从投身参与公务起，他经营的企业错过了这段时间里出现的许多机会，在进展上没法达到应有的速度。但是，他所致力管理的是比工商业务还要广泛的香港事务，香港人都为这样一位公而忘私的市民感到荣幸。”

1980年，中英政府将香港主权回归问题提到正式议程上来，立法局就英国要不要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等问题展开辩论。黄保欣首当其冲，仗义执言“香港本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

有人主张主权回归后，对香港的管制权再由英国保留30年，黄保欣亦当即坚决表示反对：“今天，当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期限结束的时候，没理由再让中国人继续蒙受历史遗留下的耻辱。”

1985年，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黄保欣受命担任委员，参加政制和经济两小组的工作，并担任了经济专题小组的港方召集人。

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以后，身为基本法起草委员的黄保欣功成身退，转而参与到“一国两制”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并兼任中心副主席职务。

1997年7月1日，是黄保欣与很多中国人一样永生难忘的一天，同时，也可能是他此生最为忙碌、最感自豪的一天。

1998年，黄保欣当选为第九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直至2003年。

在尽心尽力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做出大量工作和奉献的同时，黄保欣还十分关心家乡和内地事业的建设发展。他先后投资创立厦门联侨有限公司和惠安的惠侨塑料制品厂；1992年又将1970年在香港创办的人造皮革厂搬到深圳，成立联侨合成皮革（深圳）有限公司，这是他在大陆兴办的第三家工厂。

黄保欣重视教育，虽然企业没有做到很大，个人财富也较为有限，但他仍然慷慨捐资，兴办教育。

1995年，他为母校泉州培元中学捐资200万港元兴建了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黄润苍教学楼”。2001年4月厦门大学建校80周年庆典时，他又与夫人共同捐资500万港元兴建了嘉庚群楼一号楼——“保欣丽英楼”。

1998年，黄保欣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特别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以表彰他对香港发展的杰出贡献。

（节选自《华商名人堂》、《香港华人头条》、《环球网》报道）